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内涵及其构建路径\*

阎光才

［摘 要］ 所谓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即在广泛吸纳国际高等教育先进经验的 同时，以强大的韧性与定力，持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实现高等教育整体 质量或品质的卓越和整个体系运行功能的卓越。 当前，中国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构 建，既要具有目标和规划导向，更要增强问题意识，明晰政策框架，稳定预期，推动不同类 型高校以长期主义探索个性化、特色化和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要全面检视高校人才培养 的苏联模式与美国模式“混搭”的弊端，拓展学生学习选择空间，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与优 质教育资源共享，为每个学生的个性化与多样性发展和追求自我卓越、为不同领域大批拔 尖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要反思高等教育领域各种评估以及与评价相关项目的 不良导向，凸显价值内涵，引导高校及其师生追求品质卓越。要简政放权，支持高校面向 社会自主办学和社会参与高校办学，沟通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机制。面对当前复 杂的国际形势与科技环境变迁，中国高等教育更应坚持以我为主，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集 聚海内外优质教育与人才资源，形成全球影响力。与此同时，理性应对数字智能技术给高 等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关 键 词］ 高等教育体系；自强；卓越；构建路径

［作者简介］ 阎光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上海 200062）

2025 年 1 月 ，中共 中 央、国务 院 印发 的 《教育强 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 （以下简称《教育强 国纲要》）明确提出，要构 建“ 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围绕这一表 述，有关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方都立足不同 层面与角度予以了政策性的解读，并提出了 众多或战略性或现实性的构建路径与政策主 张 。然而，政策性的解读往往期待以明确的 目标导向、政治动员与政策行为，进行有针对 性的多点突破，在短期内摆脱困境并达成预 期 目标 。 因此，这种解读难免更为偏重手段

与工具的即时效用。本文在此尝试换一个视 角，立足 问题导 向并结合历史与 比较分析框 架，对究竟如何理解和构建“ 自强卓越的高等 教育体系 ”予以拓展性解读，以期对此形成更 为系统和全面的认识。

一、如何理解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

何为“ 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 ”？ 本 着循名责实的原则，在此不妨先将“ 自强 ”与 “ 卓越 ”两个语词分开解读。“ 自强 ”固然有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4 年度教育学重大项目“大科学时代高校高层次人才集聚模 式创新研究”（编号：VFA240009）的研究成果。

“ 自主 ”之意，即不依附于他者，主动寻求自我 发展 的路径或道路，也就是强调 自我 的独立 判断与 自主探索，因而 凸显发展路径或道路 的独特性。然而，其涵义远不止于此，因为仅 有 自主，未必就能“ 自强 ”。“强 ”带有双重意

蕴：一是过程意义上的持续坚守，代表锲而不 舍的意志力或者韧性；二是状态意义的健康 茁壮、富有活力和不断壮大的气象 。综合上 述语义，所谓“ 自强 ”，我们不妨做如下理解： 坚持以我为主、以锲而不舍的韧性和富有生 机与活力 的状态，探索具有 自身特色 的独特 发展路径或道路 。至于“卓越 ”，则显然带有 目 的与价值 内涵，或不妨理解为 自强所要达 到 的理想状态 。习惯上，人们往往把“卓越 ” 理解为锁定某一目标而相互角逐中的胜者或 锦标 。这种理解 的误 区在于，把 目 的本身作 为手段，以工具理性僭越了价值理性，因而其 结果恰恰背离 了 目 的 。其实，真正 的卓越往 往在于内在品质与格局，它的表现并不是刻 意与他者争短长，而是不甘于平庸的品质和 无惧于强者的气势。

在对上述两个修饰语进行内涵分析的基 础上，再来解读什么是“ 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 体系 ”，或许我们对其会有与以往不同的理 解 。首先，有必要对高等教育体系予以概括 性 的界定，体系也可 以理解为 由诸多存在有 机联系的要素或单元所共同构成的系统，不 同要素与单元之间的组织形式或关系就是结 构，这种结构带有人为设计 同时也有 自组织 的特点，以其各 自 的角色分工共 同服务于系 统的整体运行。结构的合理与否在于它能否 实现系统构建 的 目 的，也就是它服务于系统 整体运行的功能表现状态。具体到高等教育 体系，仅就宏观层面而言，其内部存在办学方 向与定位各异如研究型、应用型与技能型的 类型结构，学科与专业设置与培养规格差异 明显的科类结构，学历学位授予类型有别如 专科、本科、研究生等的层次结构，投资与办 学体制存在差异的形式结构以及高等教育资

源在空间意义上分布非均衡的区域结构，如 此等等 。显然，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极为宏 阔与庞杂的概念，若具体到中观与微观层面， 则更难以道尽其详 。是故，为避免讨论主题 的分散，本文在此并不刻意于体系内部具体 结构的分析，而是尝试从一个较为笼统的角 度，对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构建理念、基 本 目 的与整体运行 的功能予 以概 略性地诠 释 。这种策略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它无法囊 括与体系关联的众多议题，而是基于个体的 问题意识的有所侧重 。在此，不妨简明扼要

地以几个关键词来予以概括：自主、独特、定 力与品质。

关于 自主，简单 回溯 国际高等教育 的发 展历程，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之后，世界上所 有曾经或者当下的高等教育强国，无一不是 通过 自主探索而终成典范 。 19 世纪 的英 国， 恪守保守主义传统，缔造 了崇 尚大学 自治 的 博雅教育传统 。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则推行 实利主义，废弃了传统综合性大学，开创了高 度中央集权、重理工、专业化与带有精英倾向 的高等教育体系 。 同时期的德国，在耶拿战 役之后，则以新人文主义与德意志精神塑造 为鹄的，仿照科学院建制，创建柏林大学，开 创了由国家包办，倡导教学、科研与学习自由 原则，推崇高深学问或纯粹理论研究的洪堡 模式 。 19 世纪下半叶后 的美 国，秉持实用主 义理念，以英国博雅教育传统为底色，广泛借 鉴欧洲各国经验，塑造了至今依旧处于领先 地位的研究型大学模式以及办学特色极为多 样甚至有些纷杂的高等教育体系。

自主并不是封闭，而是以开放与包容的 格局广采众长，开展扎根于本土的改造与创 新，与此同时，顺应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吐 故纳新，因而在漫长 的岁月沉淀 中渐成各 自 的独特性。在此，所谓的独特，可以理解为体 制与发展路径的不同，也可以理解为整个高 等教育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差异 。彼此之间， 无所谓优劣，而是各有长短，甚至各自都存在

某些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也正因为缺陷的 存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 中，面对不断加剧的跨国性压力，各国纷纷启 动了从体制到整个体系内部结构的全方位改 革 议 程 。 正 如 迈 克 尔 · 多 宾 斯（Michael Dobbins）等学者 以欧盟几个 国家为典型案例 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化浪潮与新公共管理理 论思潮冲击下，为应对危机，欧洲各国高等教 育的治理都出现了共同的“市场化 ”转向的趋 势；但是，各国改革策略与路径不同，法国以 “合同化 ”多少弱化了国家中心体制，而德国 以渐进性的改革策略依然在一定程度上维系 了传统的洪堡模式。［1］简言之，虽然迫于环 境压力，各国高等教育体制与体系不得不作 出相应调整，增强其对外部变化的适应弹性， 但反映其独特性的传统上相对稳定的结构与 特质并没有被彻底颠覆。

这种对独特性或者传统理念的坚持，不 妨称之为定力，它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一个 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文化特质与整体框架的 稳定性 。定力不是保守或惰性的同义语，它 并不抗拒改革，而是在承继传统的同时，又以 沉稳和开放的心态、理性和审慎的行动，通过 渐进性的变革和不断的调适、完善来应对环 境变化，从而避免因过频、过激、反复的政策 冲动和大幅度的框架调整带来的高昂代价。 保持定力就是坚持长期主义而非短期效应， 始终坚守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即人的培养、 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的高品质。其具体体 现在以下方面：在人的培养方面，尽量以多样 化与差异性的教育充分挖掘每个人的潜能， 为其身心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 对公民素养和可雇佣能力所需要的各种硬软 技艺的训练，为其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和有 尊严的生活奠定基础，进而满足社会发展与 文明进步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在科学研究 方面，敢于闯入“无人区 ”，开展有高风险性和 智力挑战性的基础研究，主动对接国家战略、 社会发展与科技前沿，承担有前景与高价值

负载的重大应用研究 。在社会服务方面，则 需要高校破开围墙，主动融入社会，让大学不 仅成为社会与社区的文化、思想、知识和技术 的交流枢纽与散播中心，而且是推动终身学 习与构建学习型社会的核心机构。

简言之，一个 自强卓越 的高等教育体系 构建，自强是手段也是过程，卓越则在于结果 的品质或者高质量，也在于体系功能发挥和 展现得卓有成效 。 自强服务于卓越，它需要 有对 自身传统与制度优势 的坚持，更需要对 本体价值的持续坚守。这些听起来似乎都是 老生常谈、路人皆知的常识，然而在现实中要 真正践行却并不容易。《教育强 国纲要》中 明 确将包括“ 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 ”在内的 八大体系构建 目标表述为“实现 由大到强 的 系统跃升 ”。这里 的 由“大 ”到“强 ”的跃升其 实就是强调，要以价值导引和定力保持，逐渐 实现 由重量到重质、由重规模扩张到重 品质 卓越的转变。它同时也揭示了当前高等教育 体系存在某些大而不强的问题，即存在众多 痛点和难点以及既有体系内部由结构性的不 协调所带来的功能发挥障碍。

二、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

从历史角度考察，宏观层面的中国现代 高等教育体系始于清末，从 1902 年清政府制 定 的“癸卯学制 ”到 1912 年 民 国政府制定 的 “ 壬子癸丑学制 ”，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 主要模仿 的对象是 日本 。参照 日本学制，中 国逐渐形成了由清末的大学堂、高等学堂、法 政学堂、高等实业学堂、优级师范学堂以及其 他专门学堂，到民初的大学与专门学校的高 等教育体系 。 1922 年，受大量 留美 回归学者 的影响，民 国政府颁布 的“壬戌学制 ”则完全 转向了美国模式，仿照美国学制 。 中国逐渐 建立起本科、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并保 留了之前相当于专科层次的专门学校。20 世 纪 50 年代，中 国开始全面模仿苏联模式，通

过对 旧 中 国大学 的改造与调整，建立 了 由综 合大学、体现行业特色的专门学院到专科学 校 的体系。［2］改革开放后，我们再次把 目光 投 向欧美等 国家，特别是于 90 年代又开始借 鉴美国综合大学模式，在全国一度掀起高校 合并与专 门学 院综合化 的浪潮 。进入 21 世 纪，中国又开始吸纳德国与美国经验，启动了 专科层次的改造，确立了其高等职业教育定 位。为鼓励高校合理定位、办出特色，又新增 了职业本科、应用本科与专业硕士和专业博 士等培养类型。

应该说，百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变迁，始 终是一个不断学习、借鉴 国外经验 的 自主探 索过程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伴随中国 经济全球化不断走向深入，高等教育也被快 速卷入了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从重大决 策依据如人力资本理论、高等教育发展的大 众化与普及化理论到治理方式变革理念如新 自 由主义思潮与新公共管理理论，从引入 国 际科学计量指标的对标与比较如大学排行 榜 、基 本 科 学 指 标 数 据 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排名 和 自然指数等到借鉴 国 外人才培养理念与制度如通识教育、学分制 与学业评定的绩点制等，在持续对外开放与 学习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的确取得了快速 发展，特别是在培养规模、大学排行以及科研 发表数量等方面都有不俗表现，也奠定了当 今中国作为世界高等教育与科研论文产出大 国的地位。但是，理性审视与反思当下现实， 在高等教育体系构建 的 目标指 向上，过于关 注中外对标乃至由此形成的指标依赖表明， 我们尚未真正摆脱依附性而达到自立自强的 境界。无论是在人才培养还是在科技研发方 面，我们虽有数量与规模之巨，但还难以企 及卓越之实 。具体而言，有如下值得关注的 问题。

（一）高等教育体系与结构缺乏稳定性

多年来，有关高等教育体系与结构改革 的政策始终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导致高等教

育体系与结构调整 的 目标导 向游移不定，影 响了体系内部不同类型高校合理定位，缺乏 持之以恒追求自我卓越的定力。如果纳入长 时段考察，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与结构 都并非处于绝对 的稳定态 。但是，在一定 的 历史时期它往往具有相对稳定性，这有利于 不同类型高校锚定既有定位，守住本分，在自 己的轨道上追求卓越品质。美国的高等教育 体系虽然极为多样化且富有个性特色，但其 由传统私立研究型大学、州立大学系统、独立 文理学院到社区学院主流体系的构建，大致 始 于 19 世 纪末 ，成 型 于第二次世界 大 战结 束，历时五十多年。其后，虽然也诞生了少数 办学宗 旨别 出心裁 的新型机构，如密涅瓦大 学、欧林工学院等，但整体结构基本保持稳 定。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教育体制 改革大都相对保守，其整体系统与框架相对 稳定 。例如，德国的双元制教育正式形成于 20 世纪初，有一百多年 的历史，综合性研究 大学则有两百多年的传统，其应用技术大学 的传统最早可溯至 1770 年 的柏林技术大学 和分别创立于 1825 年、1829 年和 1868 年的卡 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斯图加特大学和慕尼黑技 术大学。［3］德 国其他大部分应用技术大学则 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为 了满足 高等教育民主化诉求以及社会对应用技术人 才的需求，由工程学校、设计学校等发展而 成 。 目前，德国已经基本形成了数量与类型 稳定 的高等教育体系—— 综合性大学有 108 所，传统师范、神学和艺术等学院或大学有 74 所，应用技术大学有 108 所、公共管理学院 有 29 所；［4］不 同类型机构 的数量相对稳定， 培养定位基本明确，如综合性大学近年来尽 管受到市场化与创业取向的冲击，但洪堡模 式的理念依旧根深蒂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始，尤其在 90 年代末 扩招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在规模大幅扩张的 同时，也进入了一个带有震荡式的综合化、升 格（专科 院校升格为本科 院校，本科 院校升

格为研究生培养单位）以及专科和部分本科 向技能型、应用型转向的改革期 。上述一系 列改革无疑有其时代与境遇的合宜性 。但 是，由于政策缺乏长期周全考虑以及评价工 具单一性、资源配置的政策倾向性，中国不同 类型高校的类别定位与特色并不明显，以至 于还难 以摆脱长期 以来广受非议 的“千校一 面 ”的僵局。除此之外，还有政策的模糊性原 因：一方面，对于结构调整究竟是重类型还是 重层次，相关政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往往 把高校引向了对“升格 ”和“重点建设项目 ”的 追求，弱化了其对个性与特色长期锻造和追 求自我卓越的定力；另一方面，国家学科与专 业 目录 的规制刚性、学科与专业评价 的指标 化倾 向，又抑制 了高校结合 自身条件开展 自 主探索的积极性 。也正因为如此，加之历史 遗留与传统惯性因素，如今各省份纷纷推出 的众多分类框架，不仅过于繁复，而且依旧存 在定位模糊与操作困难等问题。

（二）人才培养体制与培养规格缺乏灵 活变通性

客观而言，多年来中国高校尤其是本科 层次人才培养制度的改革，长期以来带有线 性思维和简单加法倾 向，导致人才培养个性 化与多样性不足，抑制了不同领域众多拔尖 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 。如上，由于定位的游 移不定与相对模糊，高校往往会选择更为稳 妥或保守的策略，维持既有相对单一的人才 培养模式与规格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高等 教育带有突 出 的苏联专才模式特征；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借鉴美 国大学模式，引入 了学分 制并启动了通识教育探索与改革 。但是，由 于苏联模式与美国模式在培养理念与体制上 大相径庭，这种拿来主义的策略在现实操作 中难免存在冲突 。如前者培养 目标 明确，与 社会特定行业乃至岗位高度对接，培养方案、 专业课程 内容与课程组合结构刚性，面 向特

定专业所有学生；后者则更倾 向于尊重个体 学习自由，以相对灵活的专业、课程或课程模

块 以及辅修与双学位等项 目 的 自主选择，为 学生个体发展需求创设空间，因而体现了人 才培养的个性化、差异化与多样性 。为应对 两种模式之间的不协调，多年来，中国高校基 本采取了以苏联模式为主、美国模式为辅的 “ 混搭 ”或者简单加法策略。［5］如此，势必导 致大学课程门数过多与学分总量过高，且带 来课程结构散乱的问题。课程门数过多与必 修课 比例高，客观上也 限制 了学生结合 自身 潜质、偏好、需求和专长自主学习的机会。

概言之，这种“混搭 ”策 略 的结果，一方 面可能会折损传统专才模式重专业理论与实 践应用结合的长处，因而无法保障人才培养 的整体质量提升；另一方面又因没有凸显美 国模式为满足个体差异性与个性化教育需求 而带有 的灵活性，难 以为每一个个体追求 自 我卓越创造条件 。甚至于，在不少高校出现 了另外一种针对不 同人群 的“混搭 ”格局，面 向大多数人群的培养模式更倾向于刻板的苏 联模式，面向少数所谓拔尖人才群体则偏灵 活的美国模式，即“一校两制 ”现象。如此，以 制度性隔离人为地制造了不平等，不利于更 多不同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

（三 ）高等教 育评价存在 不 良 的功利化 取向

基于利益驱动的评估制度与评价文化， 导致高校办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功利主义倾 向全面渗入整个体系的各个环节，扭曲了人 们对卓越品质与长期价值的理解。高等教育 领域评估与评价制度 的形成始于 20 世纪80 年代 。 1985 年 的《中共 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 出，为 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宏观指导与管理，“教育管 理部门还要组织教育界、知识界和用人部门 定期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估，对成 绩卓著的学校给予荣誉和物质上的重点支 持，办得不好的学校要整顿以至停办”。以此 为开端，在高等教育领域，由政府相关部门、 政府下辖事业单位以及众多中外民间机构组

织的各种评估开始纷纷涌现，且逐步扩散到 高等教育各层次和各领域，诸如体现机构办 学水平的重点建设高校的遴选以及各大学排 行榜、学科与专业水平评估，及至教师的工作 绩效考核与学术能力评价、学生的学业评定， 如此等等。 由于评估关联到不同评估对象的 切身利益，为体现程序正义，基于有显示度指 标的刚性量化评价渐成风尚，它不仅主导了 高校的办学方向，而且以缓慢渗透方式重塑 了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习惯，因而构成一种特 殊的评价文化。

高等教育领域评估制度初设的目的本来 是为了简政放权，改变以往政府刚性的行政 干预方式，以评估手段促成高校以及师生形 成 自我约束机制，并鼓励高校充分发挥主动 性与能动性，开展自主探索并逐渐形成特色， 激发师生的内在价值驱动，追求个性发展与 自我卓越。但是，多年以来，在越来越偏重指 标化的定量评价导向下，“以量代质 ”的现象 极为普遍，高校及其师生的行为都不同程度 发生 了扭 曲，偏离 了人才培养 旨在兼顾个体 自 由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科学探究 旨 在兼顾智识与智慧创新和服务于国家经济科 技 发展 的 根本 目 的 。正 因 如此 ，2020 年 10 月，中共 中央、国务 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力求以“破五唯 ”扭转上 述不科学的评价导向。

然而，指标青睐已成相关部门与行动主 体的思维惯性，甚至构成一种集体意识或无 意识，因而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领域 的沉疴宿疾 。不在根本上扭转这种倾 向，回 归评估的价值本位，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就难 以破解“大而不强 ”的魔咒，实现 向 自强且卓 越的境界跃迁。

（四）高校与社会双向互动机制不畅

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动力不足和保 障机制不够完善，社会行业产业部门参与办 学的机制不畅，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的人才培 养与科学研究难以适配社会需求，甚至在诸

多领域滞后于社会行业产业的科技前沿。早 在 1985 年，《决定》就明确提出，“扩大高等学 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 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 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 力”。2010 年 7 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对高等 学校 的 自主权又做 了更具体 的 阐述，如鼓励 高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 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 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并就高校与 社会的合作机制，如“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 会或董事会”，“探索高等学校与行业、企业密 切合作共建的模式，以提高服务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的能力 ”，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的意见》，又倡 导“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尊重基 层首创精神”，提出要“坚持放管服相结合，深 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构 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

然而，客观而言，尽管历经四十多年的 体制改革，当前高校面 向社会 自主办学与社 会参与高校办学的双向互动体制机制至今尚 未理顺 。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政府 与高校间关系的界定依旧不够明晰，高校办 学 自主权一直未能真正得 以落实；二是社会 参与办学的通道不畅，难以介入高校的办学 定位与人才培养过程；三是受制于国家学科 与专业 目录 的刚性规制，高校缺乏根据社会 需求与行业发展前沿 自 主设置专业 的积极 性；四是学科与专业评价方案的统一性以及 对相关指标的偏好，尤其是政府将该评估结 果作为资源配置依据的制度设计，在很大程 度上左右了高校的决策及其办学行为取向。 除此之外，囿于既有学科文化以及对学科规 范和学术水准的传统理解，不同学科与专业 共 同体 的 内部 自我设 限，也往往抑制 了其根 据不同领域科学最新进展和行业产业科技前

沿进行自我改造、变革与创新的活力，学科之 间的交叉与互动依旧存在重重障碍。

以上诸多方面，是导致高校人才培养规 格与社会需求结构脱节的体制性因素，现实 中众多现象的存在，如由政府主导、带有周期 性的大量学科与专业撤并，新兴产业所需专 业人才存在大量缺 口，交叉学科与复合型专 业孵化难，学术型、应用型与技能型专业彼此 之间界限模糊，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水准混 淆不清，如此等等，都与之有不同程度的关 联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伴随培养规 模的迅速扩大以及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变 化的高度不确定性，由体制性障碍所带来的 上述问题将会愈加突出。因此，新形势下，如 何通过政府、高校与社会新型关系的构建，充 分释放高校 的 自主办学活力，不仅关系到整 个体系在功能运行上能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发展的卓越，而且也关系到所有高校能否在 多样性与差异化 的制度环境 中，追求 自我超 越，实现富有个性与特色的品质卓越。

三、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构建路径

构建 自强卓越 的高等教育体系，实现高 等教育 由大到强，的确需要有立足未来 图景 的国家层面的总体与阶段性筹划，但更需要 不同部门及其行动者带着问题意识，对当下 体系的整体结构和各个不同层面与环节中存 在的堵点、难点与痛点进行理性判断与清醒 认知。越是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甚至于我不 利的环境中，越需要以临危不乱的格局保持 定力，在立足长远的同时，尤其聚焦于体系中 那些根深蒂固与尾大不掉的问题的解决。结 合上述 问题 的梳理，本文认为 中 国 自强卓越 的高等教育体系构建需着力于如下方面。

（一）增强政策明晰性与稳定性，提升高 校自主探索特色的定力

体系结构的调整应逐渐趋于稳定，增强 政策的确定性，淡化层次观念，强化类别意

识，引导不同类型高校把精力全面投入到内 涵建设中。诸如重点建设项目（大学与学科） 的竞争性制度安排与动态调整策略，为高校 升格留有余地的政策模糊，的确会以一种外 在诱致性机制促进高校致力于学术水平的提 升 。但是，它的弊端在于分散了不同机构围 绕自身定位与特色形成的持续发力。历经改 革开放 以来 四十多年 的探索，无论是在 国家 还是省域层次上，当前有必要将体系中的类 型结构逐渐稳定下来，除了对专业学位授权 点的扩大、部分确有实力的高职专科院校升 格为职业本科留有余地外，不宜再做大幅升 格与扩容。其具体做法如下。

一是关于类型的定位。尽管目前各省份 已经基本建立 了各 自 的分类框架，但考虑到 各校既有学科专业资源的结构与布局，从务 实与稳健的角度，应将高校乃至其内部不同 学科作为自我定位的责任主体。二是无论国 家还是省域 的重点建设工程或项 目，不应仅 仅聚焦于研究型高校，而应该覆盖各个类型， 并尽可能落实到具体学科与专业。应用型与 技能型学科与专业因为实践性强，需要纳入 具体应用场景中培养，它们更需要有政策支 持与持续的资源投入。三是完善专业学位体 系，进一步明晰其不同于学术学位的专业或 职业水准，部分专业学位的授权点应适当向 有实力的应用型与技能型本科高校倾斜，支 持其相关学科专业不仅办出特色而且追求卓 越。四是打通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和应 用本科高校之间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以优质 资源的共享，为该类别学生的升学深造、追求 技术、技艺与技能的卓越创造条件 。五是鼓 励民间力量创办新型研究型大学和新型职业 技术大学，支持境外高水平大学、有实力的中 外企业与国内高等教育机构以高标准、高规 格展开合作或联合办学，以新机构的引入促 发整个体系的“鲶鱼效应 ”。

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卓越，不仅在于我 们是否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更在于

不同类型的机构是否都有机会且能够达到各 自 的一流或高质量，根据其各 自不 同 的定位 服务于学生的职业生涯与经济社会发展。只 有实现整个体系功能运行上的卓越，高等教 育才能全面服务于国家的教育强国战略并真 正发挥龙头作用，颠覆社会中传统的教育与 人才观念，为改善基础教育领域长期 以来 由 不良升学竞争而恶化的生态奠定基础。

（二）走出“混搭 ”困局，为学生个性发展 拓展空间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增强灵活性，压 缩课程门数与学分总量，拓展学生选择空间， 以个性化与多样性的教育，为每个学生追求 自我卓越、为拔尖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营造 环境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面对规模越 来越庞大的受教育人群，传统的苏联模式既 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教育发展需求，也难以 应对外部复杂多变的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力 市场需求 。当前，针对高校特别是本科院校 中普遍存在的苏联模式与美国模式“混搭 ”所 带来的诸多问题，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亟须展 开如下方面的变革。

第一，明确应用型与技能型高校及其专 业的专业教育取向和研究型高校通识教育基

础上的专业教育取向，调整乃至变革人才培 养规格与方案，压缩多杂的课程门数与学分 总量，提升课程的含金量 。第二，重组课程 体系及其结构，加强不同课程包括通识与专 业课程之间，特别是不同专业课程之间的有 机联系，解决专业课程设置的随意性以及组 合的碎片化和拼盘化问题 。第三，凝练专业 课程体系，提升专业核心课程质量，加长其 学习周期，强化专业理论与专业实践的有机 融合。第四，适当压缩必修课比例，扩大选修 课 比例，满足学生多样化 的兴趣需求 。结合 专业前景与学生职业生涯发展需求，以专业

主修方 向或模块选择 的多样化，为学生 自主 学习、深度学习与专业训练的系统性与结构 性创造条件 。第五，开放本科生专业选择的

空间，以尽可能覆盖所有专业的辅修和双学 位项 目、结合共性与应用技术开发 的微课程 和微专业，为学生拓展性学习与就业能力提升 增加机会。

除此之外，结合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 与新文科 的建设要求，打破高校 内部 院系与 学科壁垒，实现学习资源共享，结合产业与 科技前沿设置交叉与跨学科专业，培养高水 平复合型人才；针对不同类型高校及其学科 专业的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专业实践、科 学探究、技术应用与研发的资源，以丰富的 课外资源培植专业兴趣与抱负，发掘学生的 创新潜质 。最后要特别强调，拔尖创新人才 具有领域性特征，并不局限于少数高校、少 数学科，而是覆盖所有类型高校及其学科专 业 。在开放与共享的学习环境中，自然涌现 而不是人为规划更符合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 出的规律 。 因此，高校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不仅应面向全体并提供人人均等的学习机 会，而且要建立一种尊重个体需求、提供有 针对性引导的多元、开放、动态的培养机制， 通过实现优质学习资源共享、营造利于个性 发展 的 良好生态，促使大批各类拔尖创新人 才脱颖而出。

（三）弱化过强的利益关联，回归评价制 度的价值本位

彻底扭转不 良 的评价导 向，清理过多过 频的评估项目，拉长评价周期，引导高校及其 师生摆脱急功近利的误区，以长期价值的追 求实现品质的卓越 。2020 年 10 月印发的《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 要“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 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 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 性、客观性 ”的基本原则，并分别对高等学校 及其师生评价的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该文 件的高规格足以表明了评价问题的严重性。 结合文件的要求，本文在此提出如下改进与 改革路径。

首先，清理过多或非必要的评价以及与 评价相关 的项 目 。当前，高等教育领域 的评

价其实存在两种类型：一种为显性评价，即由 官方与民间不同部门与机构针对高校及其教 学、学科、实验室以及学位授权点等展开的周 期性评价，包括各种质量认证、审核评估、合 格评估和水平评估等；另一种则是嵌在特定 项 目 中 的隐性评价，如来 自政府与高校部 门 繁杂 的竞争性重点建设项 目、人才计划、奖 项、培优与评优项目。相对于前者，后者不易 为人觉察，但 由于它们往往作为机构或个体 日常性考核与评价的关键性指标，关涉评价 对象的核心利益，反而是构成人们精力分散、 精神焦虑 以及功利取 向 的重要诱 因 。 因此， 全面清理各种与评价相关 的项 目，在 当前显 得尤为迫切与紧要 。其次，对确有必要的评 价以及与评价相关的项目，如机构办学水平、 学科实力和教师学术水准评估等，拉长评价 周期，并根据不同学校特色和学科特有属性， 实行分类与多元评价。彻底摒弃笼统排序行 为，淡化简单量化的指标性评价，突出品质， 注重学术影响力的同行评价，凸显人才培养 实效与科研的社会贡献评价 。再次，针对当 前大学中普遍存在的为追分数而“内卷 ”的现 象，有必要解除综合成绩与个人利益如保研 和奖学金等之间的强关联 。譬如，可大幅放 低保研分数（绩点）的 门槛，甚至在具备条件 的高校可实行全面开放的研究生招生申请考 核制度，加强对申请者的求学抱负、专业兴 趣、个性潜质尤其是领域性特长的考察 。如 此不仅会更有利于高校及其学科对有创新潜 质人才的辨识与甄选，而且会反向引导学生 依其个体禀赋、偏好、兴趣以及职业生涯发展 定位 自 由成长，以每一个个体对 自我卓越 的 追求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卓越。

当然，淡化定量的指标性评价并非完全 摒弃指标，而是充其量将其作为参考依据。 但是，对于重点建设项目的评价，必须凸显其 在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原创性成果或技术领

域的重大突破。对人才项目的评价需要兼顾 两头并有所区分，即学术生命周期前期学者 的潜质考察与 中后期学者 的成就认可，前者 重在能力识别与发展支持，后者重在荣誉表 彰与精神鼓励，强化评价过程的透明性与公 正性，弱化评价结果过于浓重的功利性 。总 之，在评价的工具理性与效用取向过于突出 且偏离 了其本体价值 的今天，有必要再次 回 归价值原点，立足于高等教育体系运行功能 与品质的卓越，重新思考要不要评、为何评、 评什么、谁来评和怎样评等根本性问题，以合 理的设计缓解乃至消除各种评价强于外在驱 使而弱于内在驱动的不良效应。

（四）推动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畅通 社会参与办学渠道与机制

扩大高校办学 自主权，沟通与拓宽社会 参与办学渠道，淡化学科专业 目录 的管理与 规制功能，分类引导，支持高校及其学科专业 结合 自身定位办 出特色 。建立 自我激励、自 我约束 的机制，确立高校作为 自主办学 的责 任主体，全面释放发展活力，这是历年来高等 教育体制改革的共识 。加强高校与社会联 系，支持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沟通社会参 与办学渠道，也是多年来高校治理结构改革 的重点议题 。但彼此之间的互动机制不畅， 导致二者之间的合作特别是产教融合往往形 式大于内容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面 对毕业生就业以及职业生涯发展需求压力的 持续加剧，中 国高等教育依 旧有待在体制机 制层面取得如下突破。

第一，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 国高等教育 法》相关规定，依法保 障高校相关办学 自 主 权，特别是逐步下放学科与专业设置与审批 权。支持高校围绕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需求 与科技发展前沿，合理增设与撤销学科种类 与专业品种。国家与地方政府可采取宏观调 控、政策引导、信息服务、常态监测、定期审核 与质量评价等方式，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并 督促改进或调整，以保证质量 。鼓励高校立

足国家战略以及学术和行业产业发展前沿， 特别是在涉及当前科技与民生的关键性领 域，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健 康、能源、绿色低碳、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国 际组织、金融科技等，提前规划与布局，以前 瞻性眼光自主设置与调整学科专业。

第二，落实高校理事会或董事会等机构 参与办学的权利与责任，使之真正成为高校 与社会之间互动与合作的枢纽。疏通高校与 行业产业之间的交流与融通机制，兼顾学科 专业设置的学术与行业产业属性，增强高校

专业结构与行业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度。畅 通行业产业等用人部门参与通道，以产教融 合促进专业水平的提升。参照有关行业协会

或专业学会的认定或认证标准，以联聘方式， 吸纳相关人员参与高校的新专业设置、培养 方案制定、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等工作 。推 动高校与用人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共建实 训基地以及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等， 扩大学生在真实工作情境中开展实践与实训 的机会。

第三，完善学科专业 目录编制与修订 的 多方参与机制 。学科专业 目录 的编制，需要 有政府、学术界与产业界如行业专业组织以 及资深人士三方 的共 同参与，兼顾 国家（战 略）、学科（学术）与行业产业属性。增强目录 编制的灵活性，根据社会与科技发展形势做 动态调整，保证目录至少五年一个修订周期。 与此同时，弱化目录的规制刚性，凸显其作为 参照性框架的指导与统计的功能。除关涉国 家战略的相关学科、冷门绝学、特设专业与国 家控制布点专业外，允许高校结合 自身 的学 科资源条件、优势与社会发展动态，针对目录 中一般性特别是传统学科与专业，重新厘清 自己的培养定位和培养规格，实现改造升级 与迭代优化。不强求培养规格的统一与模式 化，由高校 自主制定培养方案与建构课程体 系，形成 自 己 的学科与专业人才培养特色。 此外，放低乃至放开目录外专业设置限制，开

展试点，推动部分高校如研究型或应用型本 科高校，结合自身学科优势与市场长远需求， 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和新的专业品种。建议可 适当把学科与专业设置限制由入口端转向出 口端，持续开展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与职业发 展能力监测与评价，通过及时反馈并结合对 社会发展的长期预测进行相应调整。

（五）坚持以我为主，主动应对国际环境 变化与挑战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与新科技革命 时代的到来，以更加沉稳的心态应对挑战，以 更加主动的姿态承纳变革，保持定力与富有 韧性，为 自强卓越高等教育体系 的构建创造 机遇和营造环境。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 本身就是不同时期借鉴国外经验的结果，它 的确多少带有某些依附性特征 。但是，要实 现 自强绝非闭关锁 国，而是如何做到 以我为 主，在即使不利的国际环境中更加致力于塑 造国际友好的形象；在开放互鉴中广泛吸纳 与融汇中外先进经验与优质资源，推动高等 教育实力与水平的整体提升。本文在此仅概 略性地提出如下几点。

一是 自强卓越 的 中 国高等教育体 系构 建，更需要加强与国际高等教育之间深度交 往与互通有无 。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持 续提升传统的留学教育、国际学术交流与科 研合作 以及 中外合作办学等项 目质量 的 同 时，确立专业组织、高校及其院系与实验室、 教师个体在国际交流中的主体地位，以广泛 的民间交往突破政治与意识形态障碍，增进 国际理解，全面扩大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合 作网络 。二是善用科学外交策略，以建设大 科学装置与发起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为平 台，吸引与集聚海外高层次人才，围绕基础科 学领域前沿问题与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难题 展开合作研究，以服务于人类福祉塑造中国 科学友好形象，提升中国高校科技实力 。三 是充分利用由互联网与数字智能技术支撑的 全球开放科学网络以及虚拟实验室，在广泛

吸纳与利用国际高水平大学的教育与科研资 源 的 同时，向海外输送 中 国高校优质课程资 源与教育经验，扩大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辐射 力与话语影响力。

（六）顺应人工智能时代潮流，营造高校 教育教学新生态

人工智能技术对高等教育带来的冲击， 最早始于计算机技术 的普及与互联 网革命。 在各种工作场景中的人机协作，逐渐取代了 传统上由人力承担的大量程序性工作。近年 来，以语言大模型为代表的生成性人工智能 技术的迅猛发展，则进一步波及传统意义上 的脑力劳动或知识型的工作 。 因此，面对当 前以及未来不可遏制的人工智能时代潮流，

所有高等学校都不得不承受两方面压力：一 是由生成性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知识易得 性乃至思维替代性，必将颠覆传统的师生关 系与教育教学形态，打破高校既有教育教学 秩序；二是 由人工智能技术催发 的社会行业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不同职业以及岗位工作 属性的变化，使得高校的学科专业结构与培 养规格都将不得不做相应调整乃至变革，否 则它们将难以适应工作世界对毕业生的能力 与素养要求。

任何技术都存在双刃剑效应，面对上述 冲击，高等教育有必要立足教育的底层逻辑， 即以人为本的育人属性，在理性审视与防范 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又能将技 术真正赋能于人的个性发展与能力提升；在 注重学生 的“智能装备 ”训练 的 同时，又能培 植其摆脱智能技术依附的能力，开创其富有 创造活力和有生命意义的职业生涯。

至于如何应对当前及未来人工智能技术 给高等教育带来 的挑战与机遇，赋能 中 国 自 强卓越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本文认为，当前 有如下几方面有待展开探索性的实践研究。 一是对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赋能教育 既要持开放立场，重构人工智能介入下的教 育生态，同时也要以冷静的态度理性审视其

可能存在的缺陷。人工智能的确会赋能个性 化教育，打破教师的知识垄断，丰富学生的学 习经验，提高学生的知识学习效率。但是，人 工智能并不能代替人的思考，更不能取代人 带有涌现性的创造过程，因此，如何防范人工 智能可能存在的“赋弱 ”效应以及诸多伦理问 题更值得关注。二是面对未来社会各个领域 不可逆转 的“人工智能化 ”趋势，高校将不得 不结合学生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重新 审视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的培养理念和人才的 核心能力素养结构，包括数理素养、人文关 怀、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不同工作场景 的人机结合能力，等等 。全面评估不同学科 与专业及其关联职业的人工智能暴露度及其 潜在的应用空间，审时度势，调整学科与专业 结构及其课程体系；吐故纳新，淘汰陈旧知识 与过时技术，增加新内容并突出学科的交叉 性。以人工智能与学科专业内容的有机结合 和融入而非简单 的“人工智能 +”, 提升学生 对未来工作世界的适应性与应变能力。三是 人工智能时代必将对既有的高校管理乃至整 体高等教育体制带来颠覆性的影响，如何在 充分利用数字智能技术在不同层面实现精准 管理与服务的同时，又能确立人的核心地位 而不至于使其陷入由数据、算法与技术钩织 而成 的 当代“理性 的铁笼 ”，都亟待我们开展 超前性研究。

总之，立足长远 目标，以 问题为 出发点， 在坚持 自主发展道路独特性 的 同时，吸纳 国 际先进经验，以相对稳定的政策框架，增强不 同类型高校对未来 的长远预期，围绕 自身优 势特色与价值 内涵持续发力和保持韧性，这 是构建 中 国卓越高等教育体系、实现 由大到 强的基本路径。

参考文献：

［1］ Michael Dobbins，Christoph Knill.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France，Germany，and Italy：Change and Variation in the Impact of Transnational Soft Governance［J］. Policy and Society， 2017，（1）.

［2］王红岩 . 20世纪 50 年代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历史 考察［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1—43.

［3］ Natalia Andriichuk，Anna Dynovych. Higher Technical Education System in Germany［J］. Journal of Vasyl Stefanyk Precarpathian National University，2022，（1）.

［4］Dirk Michel Schertges，Claudia Schertges. Higher Education

in Germany［A］. K. M. Joshi，Saeed Paivandi. Higher Education Across Nations［C］. Delhi：B. R.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14. 285— 331.

［5］邬大光 . 走出我国大学转型发展的路径依赖［J］. 中国高 教研究，2021，（10）.

The Self-Reliant and Excellence-Oriente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Connotations and Construction Pathways

*Yan Guangcai*

Abstract: A self-reliant and excellence-oriente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dicates the extensive absorption of advanced experience from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into an independent pathway of development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by means of powerful resilience and determination , for the purpose of achieving overall excellence in both the quality and function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Currently, to build a self-reliant and excellence-oriente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we should not only have goals and overall planning, but also strengthen a problem-oriented mindset, clarify the policy framework, stabilize people's expectations, and push different typ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explore individualized, distinctive and differentiated pathways of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term;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the hybrid drawbacks of the Soviet and American models in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xpand students' academic choices, share equal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create conditions for all students' individualized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and their pursuit of self-excellence, and for the emergence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n different fields; reflect on the negative orientations of various evaluations and assessment-related projects in higher education , highlight value connotations, and guid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i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pursue excellence in quality ; and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delegate powers, suppor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ir independent operation for the public, support the public in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oper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establish an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public.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changes in the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adhere to a self-determined approach, make more efforts to open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gather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talen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exert global influence. Meanwhile, we need to respond rationally to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to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self-reliance; excellence; construction pathway

Author: Yan Guangcai, professor of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责任编辑：刘 洁］